

# 辛亥革命在西藏及相關問題\*

康欣平

[提要] 西藏辛亥革命於 1911 年 11 月 13 日發生,其領導者為一些清朝駐藏官兵與哥老會骨幹成員。由於西藏辛亥革命引發辛亥時期西藏政局混亂,很多論著將其與駐藏川軍行為一併視為變亂或動亂。這一看法與相關史料的立場有很大關係。由於絕大多數史料出自敵視西藏辛亥革命者之手,運用這些史料時要仔細辨析,綜合考量。西藏辛亥革命有其自身的邏輯,符合歷史大勢。溯源西藏辛亥革命“變亂說”,袁世凱和北洋政府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關鍵詞] 西藏辛亥革命 何光燮 陸興祺 袁世凱 北洋政府

[中圖分類號] K257.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2 - 0172 - 08

辛亥革命是 20 世紀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其研究在中國近代史等領域經久不衰。近年筆者翻閱有關西藏地方近代史的論著時發現,21 世紀以來認可西藏辛亥時期“變亂說”的學人、論著明顯已佔據多數。<sup>①</sup>如《民國藏事通鑑》認為,辛亥時期西藏發生了政治動亂,造成中央政府對西藏統治的失控。<sup>②</sup>也有學者認為,清末民初西藏拉薩發生動亂,該亂事雖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發生,然其性質與內地各省回應武昌起義的行為不同,不屬於辛亥革命的一部分,不能歸於革命範疇。<sup>③</sup>筆者以為,對西藏辛亥革命應予肯定,將其置於歷史場景和脈絡之中進行評價。

## 一、西藏辛亥革命發生的時間、領導者及其走向

西藏辛亥革命的籌劃與四川保路運動有關,然實施在武昌起義之後。《辛壬春秋》<sup>④</sup>記載:“至(宣統)三年七月,藏軍聞四川爭路大亂,皆欲回川。又數月不發餉,於是哥老會首葉綸三、田得勝、蘇宗幹、張榮繁、嚴步雲、吳金山、郭秉侯等,喉軍人為變。九月丁亥,拉薩兵嘩變,搶劫兵備處軍械糧餉。戊子,劫駐藏大臣官署庫房各局所及街市鉅商,舉兵備處書記官李治平、標部書記官范金為總參謀。……己丑夜,治平命田得勝等率兵入署,擒聯豫置札什城營中”。<sup>⑤</sup>引文中“九月丁亥”為農曆九月二十三日,西曆 11 月 13 日;“戊子”為農曆九月二十四日,西曆 11 月 14 日。

《西藏交涉紀要》稱:“波密既平,炮隊先回拉薩,以轉戰千里,勞苦功高,求預支月餉不能得,志

\* 本文係西藏民族大學重大培育項目“晚清中央政府治藏思路研究”(項目號:19MDZ10)暨西藏文化傳承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西藏民族大學)委託課題“有泰的思想歷程研究”(項目號:XT-WT201822)的階段性成果。

已怏怏。適川路事起，消息傳至，張錫候、嚴少雲、葉綸三等原屬哥老會中人，乃日以劫庫回川嗾其黨，故炮隊反形漸露。……亂黨見事急，乃以彈殼數箱繳呈，一面又潛通衛隊中軍官馬武之、護軍官王久敬、製造廠匠目沙佐庭，及土兵營隊官張文華、排長何永超、司務長周英武等，約期於九月二十三日舉事”。<sup>⑥</sup>《西藏交涉紀要》所記“九月二十三日舉事”時間與《辛壬春秋》所記“九月丁亥”拉薩兵嘩變時間相同。因此，西藏辛亥革命發生的具體時間可斷定為1911年11月13日。20日，英國駐亞東商務委員致電英國錫金政務官和英印政府稱：中國革命已經傳至亞東關和西藏其他地方，中國亞東關稅務司已進入英國駐亞東商務代辦處避難。23日夜，被革命清軍羈押的江孜商務委員黃福明逃往印度；同日逃離的還有江孜警察局監督長虞鎬藩。<sup>⑦</sup>以上兩則英國檔案材料，亦可大略印證西藏辛亥革命的發動時間。

武昌起義的消息如何傳到拉薩，被駐藏川軍所知曉？目睹西藏辛亥革命時期情形的憂患餘生在《藏亂始末見聞記》中稱是“郭元珍、何光燮、范金、李維新四人見報紙所載內地情形”，<sup>⑧</sup>從而引發西藏革命。而陳渠珍在《艸野塵夢》中稱，“繼而武昌起義消息，由《太晤士報》傳至拉薩”。<sup>⑨</sup>由此而知，郭元珍等“見報紙所載內地情形”似應為英國《泰晤士報》所登載的武昌起義信息。

對於西藏辛亥革命的領導者，現存文獻說法不一。按照《辛壬春秋》的說法，哥老會首葉綸三等在這場革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李治平、范金等被舉為首領，起義的駐藏川軍在革命伊始就擒住了清朝駐藏大臣聯豫。《西藏交涉紀要》提及，哥老會成員張錫候、嚴少雲（似應為嚴步雲）、葉綸三以及駐藏軍官馬武之、張文華等為西藏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和發動者。《藏亂始末見聞記》則云：“郭元珍、何光燮、范金、李維新四人見報紙所載內地情形，亦始在札什城立勤王旗幟。向商上借錢，番邊以其名正言順，遂慨借銀八萬兩。及錢到手，深抱不安，遂改稱革命。但覺大孤，不得已利用袍哥。而袍哥之宗旨在打劫，隱與何等之意見相同。但何、李、范皆非袍哥，極力聯絡，不甚親密，且反為袍哥所利用”。<sup>⑩</sup>此段材料說明，西藏辛亥革命是由何光燮、范金、李維新聯合哥老會成員郭元珍領導發動。而何、范、李並非袍哥（即哥老會成員），他們與哥老會是互相利用關係。據《藏事陳略》云，策動西藏辛亥革命發生，以袍哥頭目葉林山、欽署收發范金、兵備處書記李維新、戈什嚴步雲為首，暗中主動者為聯豫戈什長郭元珍。<sup>⑪</sup>《藏亂紀略》指出，西藏辛亥革命（其文中稱“藏亂”）發生時，“當時只知郭、范、李、嚴以袍哥革命互為利用，而不知利用此四人者，大有人在也”。<sup>⑫</sup>郭、范、李、嚴指郭元珍、范金、李維新、嚴步雲，對於利用此四人者，《藏亂紀略》未指明道姓。

以上五種文獻，對西藏辛亥革命領導者姓名的記載不完全一致，其中范金、李維新（與李治平為同一人）、嚴步雲有四種文獻提及，葉綸三（與葉林山似為一人）、郭元珍有三種文獻提及，何光燮等只有一種文獻提及。可以籠統講，西藏辛亥革命領導者為一些清朝駐藏官兵與哥老會骨幹成員。

西藏辛亥革命的走向令人唏噓。據《藏亂始末見聞記》所云，革命起始時曾“立勤王旗幟”，此似為郭元珍、何光燮、范金、李維新等人對駐藏川軍大部分人思想狀況判斷後的策略，擔心一下子提出革命引起官兵激變。不過，既然是革命，就要改變清政府在西藏的統治秩序，革命的發動者將駐藏大臣聯豫囚禁於札什城兵營中。革命甫發生，引起滿洲親貴鍾穎的仇視。鍾穎利用他在駐藏川軍中的威望，帶衛兵十餘名，出其不意將葉林山擊斃，解救聯豫回署，並將范金、李維新殺死。<sup>⑬</sup>然而，鍾穎此時已無法撲滅這場革命，正好江孜駐軍有一部返回拉薩，革命風潮復盛，聯豫、鍾穎無可奈何，革命者郭元珍、何光燮等風頭正勁。《藏事陳略》描述了此時的情形：“其（指聯豫）戈什郭元珍公然大同保障，明開公口。其秘書何光燮自稱革命偉人，潛謀獨立。聯豫倚任二人，藉保身名。不意郭、何根據立憲，竟先勒令聯豫交出關防後，再刺殺鍾穎，設立議院及各部長”。<sup>⑭</sup>《藏亂紀略》

云：“馬隊營管帶汪文銘與何光燮、郭元珍、胡元凱等接到四川蒲都督獨立公文，創議西藏為四川附庸，應設一副都督，因舉何光燮充之。乃設公議局，汪文銘為局長；又設一大同保障總公口，郭元珍任之。諸事皆由議局及大同保障總公口議決施行……”<sup>15</sup>《藏亂紀略》還云：“聯既回任欽署，隨員前雲南已革道員何光燮，經眾人舉為議長，即隱有異志，而郭元珍、范金、汪文銘為之黨羽，煽惑軍心，謂滿人在天然淘汰之列，眾議舉為都督，已定期於二月初一日接欽差關防”。<sup>16</sup>“二月初一日”顯然指 1912 年農曆二月初一日，這可視為西藏辛亥革命達到高潮的一個時間點。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在 1912 年農曆二月初一日來臨之前，西藏革命由於一個決定，形勢急轉而下，最終走向失敗。當時西藏地方有武裝勢力攻擊駐江孜川軍，駐江孜營長向拉薩告急，何光燮等人籌劃，擬運槍炮子彈救援江孜，徵用烏拉，色拉寺“抗不支差”，遂有人主張派軍攻打色拉寺。不料此舉引發色拉寺堅決抵抗，西藏地方政府調集藏兵圍攻駐藏川軍。攻打色拉寺的各營營長“知禍起甚大”，以何光燮、郭元珍等不足為恃，“乃商民、各軍士復請鍾穎出而弭禍”。鍾穎復出後，設法殺死郭元珍等四人，而聯豫亦派人殺死何光燮，“革命敗而袍哥遂亦斂跡”。<sup>17</sup>

隨著何光燮、郭元珍被殺，西藏辛亥革命歸於失敗，但由此引發的混亂局面並未結束。1912 年 5 月，民國中央政府任命鍾穎為西藏辦事長官。<sup>18</sup>駐藏川軍在鍾穎率領下，與圍攻的西藏地方軍隊激烈交戰。農曆十一月初十日，駐藏川軍與西藏地方達成協議，撤出西藏。<sup>19</sup>

## 二、西藏辛亥革命應予肯定

儘管辛亥時期西藏局勢混亂給各族人民帶來苦難，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西藏辛亥革命。

第一，辛亥時期西藏確實發生了革命，後人以“變亂”等詞稱之不妥。否認西藏發生革命的研究者，所依據的史料主要為《藏亂始末見聞記》、《藏事陳略》、《藏亂紀略》、《辛壬春秋》、《西藏交涉紀要》以及《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等，這些文獻幾乎均出自敵視革命的一方，故引用時要做綜合分析。由《藏亂始末見聞記》之命名來看，作者對西藏辛亥革命抱敵視立場，如文內稱何光燮、郭元珍等為“亂黨”。該文亦記載，何、郭等“通知駐江孜後藏軍隊，各樹大漢革命旗幟，且促其來拉薩殺聯、鍾”。<sup>20</sup>“亂黨”、“各樹大漢革命旗幟”等正說明何光燮、郭元珍等在西藏發動了革命。《藏事陳略》出自駐藏川軍軍官之手，他們既是事件的參與者，也是鍾穎的部下，故該文為鍾穎辯護。<sup>21</sup>其中云：“何光燮自稱革命偉人，潛謀獨立……彼時正革命時代，（鍾穎）甘冒不韙之名，遂召集舊部，曉以利害，軍心感動，始有圍攻議院之舉。炮隊前往十餘名，尚未開槍，即鳥獸散，立將郭元珍、汪文銘正法。聯豫見風頭不利，即將何光燮正法，以謝番民。由鍾穎出示宣布亂黨罪狀，以安番眾”。<sup>22</sup>“革命偉人”、“彼時正革命時代”、“亂黨”等用語說明，這些鍾穎舊部認為郭元珍、何光燮等所發動的是一場革命。《藏亂紀略》亦出自鍾穎舊部、駐藏川軍軍官之手。<sup>23</sup>該文指責何光燮“隱有異志”，郭元珍、范金、汪文銘為等為其黨羽，他們“煽惑軍心，謂滿人在天然淘汰之列”，眾議舉何為都督；該文還記載汪文銘、何光燮、郭元珍等接到四川蒲都督的獨立公文，於是倡議西藏為四川的附庸，設立一副都督，由何光燮充任。這些指責內容豈不正是西藏發生辛亥革命的證據。《西藏交涉紀要》作者陸興祺為在印度經商的華僑，清末時就與聯豫等有所往來，民國初年接替鍾穎出任護理西藏辦事長官，據說他與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有某種姻親關係。<sup>24</sup>陸興祺在《西藏交涉紀要》中對西藏辛亥革命的發動者以“亂黨”稱之，這恰恰證實西藏發生了革命。《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對駐藏川軍持批評和指責態度，未區分西藏辛亥革命與之後的駐藏川軍行為，將二者視為一體。《辛壬春秋》記載辛亥西藏事件時較中立，既說西藏駐軍“嘩

變”，又云聯豫、鍾穎對“漢人革命”的痛恨。<sup>25</sup>後一記載說明西藏的確發生了革命。

此外，吳光耀<sup>26</sup>在《西藏改流本末紀》中記載，“藏軍黨人”分設四十八公口，郭元珍為其首領，“議推陝西人何革道光燮獨立，焚劫欽差衙門，逼聯豫、鍾穎交印，解兵權”。<sup>27</sup>此記載亦說明在郭元珍、何光燮領導下，西藏發生了推翻清政府統治的武裝起義。

辯證地說，以上史料在指陳辛亥時期西藏政局混亂的同時，也證實西藏發生了革命。絕大多數史料仇視這場革命，反映的正是作者們的視角和立場。由於迄今未見西藏辛亥革命發動者和領導者留下的有關史料，後人應辯證和多角度來看這場事件，儘量放在歷史場景和脈絡中去理解，以“變亂”等詞稱之似不妥。

第二，辛亥時期西藏政局惡化，漢藏人民受苦，但不能將此歸咎於西藏發生革命，革命領導者有其自身的邏輯。《西藏改流本末紀》稱：“非黨人鹵莽，開釁夷人，內地亂而西藏可無恙也”。“革命黨人何光燮、郭元貞（珍）等廢駐藏大臣聯豫、劫拉薩市場、攻大寺，是第一次失西藏心”。<sup>28</sup>吳光耀將辛亥時期西藏政局惡化歸咎於革命，這一評價並不公正。

據《辛壬春秋》記載，西藏發生革命後，領導者李治平等“與眾約，禁剽掠，禁戕害滿漢官，優待番民，以免妨害將來藏事，眾允之”。<sup>29</sup>此說明革命領導者和參與者並非沒有紀律意識。對於攻打色拉寺的原因，文獻記載不一。《藏亂始末見聞記》稱，1913年正月，後藏江孜川軍被藏軍圍困，祈求公議局迅速救援，議長張謀派潘文華帶兵前往。此項夫馬，輪到色拉寺支應，該寺不肯，公議局決定以武力威懾；而張雲龍貪慕色拉寺金燈，故自告奮勇帶人去攻打。<sup>30</sup>《藏事陳略》記載：“適駐札什城軍隊巡哨路經色拉寺，番人疑軍隊來探，開槍傷兵四名，軍隊還擊，鍾穎聞之，恐開邊釁，刻令劉榮武、袁鑠等馳往開導，彈壓，當即罷事。不期郭元珍、何光燮在議院建議，謂款項支絀，色拉寺金物甚多，以開槍傷兵為詞，密宣攻打色拉寺之令。焚殺搶掠，儼同寇盜”。<sup>31</sup>《藏亂始末見聞記》所述攻打原因是色拉寺不支應夫馬，亦提及張雲龍貪慕色拉寺金燈；而《藏事陳略》所講原因為款項支絀故覬覦色拉寺財物，也提到之前雙方衝突。

前文已提及，《藏亂始末見聞記》與《藏事陳略》對西藏辛亥革命持否定立場。此處再來看《辛亥革命中駐藏川軍起義始末》對攻打色拉寺的相關敘述：

江孜川軍與藏軍衝突，為引起拉薩川藏兩軍武裝戰爭的先聲。駐江孜的少數川軍被藏軍大隊圍攻甚急之時，拉薩以郭元珍為首的革命派主張立即派兵往援，令藏人支給烏拉，藏人不從，且要求陸軍全部回川，只留駐藏大臣照章辦事，恢復制營，以供護衛。革命派不允回川，且堅持藏軍必須照支烏拉，雙方爭執不下，以致決裂，遂開戰端。起義軍以藏方不肯支應烏拉，是色拉寺主張作梗，甚恨之。……時論以為起義軍因餉糧兩缺，利其財富，遂於一九一二年三月首先攻擊色拉寺，聯豫不能制；實則該寺擁有多數自衛武僧（俗稱朵朵）和武器，其力量在拉薩首屈一指，起義軍可能企圖首先摧毀對抗軍的主力。乃連攻兩日，轟以大炮，均不能克，第三日雖勉強出隊續攻，而該寺喇嘛已輕視川軍新武器，奮勇殺出，反傷斃起義軍多人。<sup>32</sup>

作者孔慶宗在此文開篇就說：“這篇稿件是我根據昔年（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在拉薩訪問身親其事的漢藏老人所得的材料，參照當時參與事變逃回內地的人員向政府報告藏情或條陳意見等文件以及檔案史冊而寫成的……”<sup>33</sup>因而，此文可視為“三親”史料，具有較高的可信度。由孔的敘述來看，駐江孜川軍被藏軍圍攻後對外求救，拉薩革命派決定派兵支援，需要支應烏拉，藏方不肯，色拉寺尤其反對，此說與《藏亂始末見聞記》所說基本吻合。但孔慶宗不認同革命派和起義軍奪取色拉

寺財富的說法，認為色拉寺擁有拉薩最雄厚的地方武裝，革命派和起義軍試圖首先摧毀西藏地方對抗勢力的主力。而《藏事陳略》記載攻打色拉寺之前，駐藏川軍已與色拉寺發生槍戰，與孔慶宗所述倒可有幾分印證。綜上，攻打色拉寺，革命派和起義軍有自己的邏輯：他們需要支援江孜駐軍，需要拉薩地方勢力提供烏拉，需要摧毀對抗方的主力，從而掌控西藏的局勢。

但起義軍攻打色拉寺遭遇頑強抵抗，革命派遂處於被動和困境中。此時，敵視革命的鍾穎、聯豫團結和利用已經分化的駐藏川軍官兵，殺死郭元珍、何光燮等人，西藏辛亥革命實際上失敗了。此後，鍾穎統率的駐藏川軍與西藏地方勢力的衝突並未停止，甚至愈演愈烈，“釁端已開……自此互相殘殺之事無日無之，大有萬難禁止之勢”。<sup>38</sup>很明顯，革命失敗之後西藏局勢的動盪，已非革命者之責。

西藏辛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在藏統治，符合歷史大勢。不能像吳光耀那樣因革命引發西藏局勢不斷惡化，人民受苦，便後見之明地指責這場革命不該發生。

### 三、西藏辛亥革命“變亂說”溯源及其理由

西藏辛亥革命在後世一些史料及著述中被指稱為“變亂”，上文已從史料淵源上作了一些分析。不過，指稱這場革命為“變亂”，起最關鍵作用的是袁世凱和北洋政府。

關於西藏辛亥革命“變亂說”，最早似可追溯至 1912 年，楊芬<sup>39</sup>和陸興祺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是年 8 月 20 日，北洋政府派出的赴藏宣慰員楊芬致電十三世達賴云：“民國初建，兵民鮮悉其和美意，藉端營私焚掠，是事各省有聞，而邊疆遠地尤烈。今內地漸平，民國底定……然番民受害較深，佛爺受累實重，殊與五族平等公例不符，政府人員頗為憐憫，是以政府委派芬等特來慰問佛爺……”<sup>40</sup>楊芬此電雖未明確指駐藏川軍變亂，但意思非常明顯。11 月 20 日，楊芬收到達賴印文一件，內容大意：華軍駐藏原為保護而來，今忽變為盜賊，燒殺搶掠，無惡不為，藏人何辜遭此慘苦；君來藏調查已久，開釁始末，諒皆有所聞，請實報大總統處辦理。<sup>41</sup>29 日，楊芬覆電稱：“所有藏局開釁情形，芬已調查清晰，據實呈報大總統……陸軍官兵應懲罰者重罰，番族生民應賑恤者厚賞撫恤，之後再將鍾穎留藏官兵概行撤川，另派馴良，按照從前舊制安設，以資保護”。<sup>42</sup>楊芬在此電中表明，駐藏陸軍官兵應受懲罰，他們非“馴良”之輩。12 月 1 日，楊芬致函達賴及兩位噶布倫稱：“今總統暨政府大員已悉藏亂實情，議決辦法，深咎前清派藏官吏，重責陸軍，恢復佛爺封號，撫恤受害番黎，不久即將施行”。<sup>43</sup>此函明確指出駐藏川軍行為是“藏亂”，並稱大總統等已知曉。翌日，楊芬再致函達賴：“前芬已將前清聯大臣所派之陸軍變亂，擾害地方，一切情形，詳陳北京政府，以期早日改革從前流弊，為將來漢番情洽如故”。<sup>44</sup>此函再次明確指出駐藏陸軍行為係“變亂”。

11 月 30 日，陸興祺致電大總統袁世凱及國務院：“竊自達賴私逃來印，阿附英人，謀復權勢，此次川軍變亂，彼請英干涉藏事”。<sup>45</sup>在此電中，陸興祺明確指出駐藏川軍為“變亂”。1913 年 1 月 6 日，陸興祺致電袁世凱云：“藏自去秋兵變，漢官陸續內渡，今聯已交卸，鍾亦隨出，軍士退伍，商人畏逃，前後藏幾無漢人足跡”。<sup>46</sup>陸在此電中稱駐藏川軍行為是“兵變”，立場似乎中立。2 月 27 日，陸興祺致電達賴：“興祺久居印度，向與藏人相處親洽。前聞駐藏陸軍變亂，生靈塗炭，深恐有礙漢藏關係，憂深慮極，即行電呈政府請予保護。……政府因興祺向與藏人親善，特命赴藏面晤達賴喇嘛等藏方官員……”<sup>47</sup>陸在此電中又稱“駐藏陸軍變亂”。陸興祺還因鍾穎等被藏官驅逐事致電達賴：“藏內漢藏為仇，歷時多載，其害為最，一切生靈無不為之痛心。卑職興祺向與藏人交往甚密，得知藏亂，甚為不安”。<sup>48</sup>其中陸對辛亥時期西藏事件用詞為“藏亂”。4 月 21 日，已任護理西藏

辦事長官的陸興祺致電西藏地方政府諸噶倫稱：“以興祺之見，藏亂概因駐藏漢官不明實情，彼此猜疑所致。……陸軍借此侵擾，西藏無太平之望”。<sup>⑤</sup>此電文中，陸興祺說駐藏川軍行為是“侵擾”。8月22日，陸興祺致電袁世凱、黎元洪等，指稱駐藏川軍行為係“兵亂”，而藏人不知國家實情，“外人又借報紙謠傳肆其煽惑”。<sup>⑥</sup>

楊芬和陸興祺對辛亥時期西藏事件的相關表述，直接影響到大總統袁世凱和北洋政府對此事件的看法。1912年12月21日，袁世凱致電達賴云：“近聞藏內漢藏干戈未息，局勢悲慘。……為地方安寧起見，本總統已命鍾長官休戰，將由中央調停。……待事件平息後，可派官員查明漢藏孰是孰非，商討長治久安事宜”。<sup>⑦</sup>發此電文時，袁世凱欲保留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力量，沒有明確指出鍾穎率領的川軍為過錯方。1913年，袁世凱又致電十三世達賴：“駐藏官兵違紀變亂一事，待查明後撤離”。<sup>⑧</sup>此電文進了一步，承認為駐藏官兵“違紀變亂”。此外，袁世凱在1月29日致達賴電文中云：“藏地本與川、雲各省相為唇輔，自上年擾亂以後，漢番火熱水深之厄甚於倒懸，故特加復執事封號給還噶布倫廈札等官職……鍾穎等，俟善後事宜商定後，即可另行撤換，亦請曉諭藏中。該長官等如有過愆，將來查辦，絕不袒護，以平番民之心”。<sup>⑨</sup>袁世凱的這封電文表明了他處理辛亥時期西藏事件的傾向：安撫西藏地方統治者，答應鍾穎等若有過錯一定查辦。

1914年10月，羅春馭上書袁世凱訴其父羅長禔在西藏為鍾穎所害，袁下令逮捕鍾穎。經審判，袁世凱於1915年3月19日下“大總統申令”處死鍾穎。<sup>⑩</sup>“申令”中所宣鍾穎的罪名有：“自拉薩兵變及色拉寺之役，始釀成亂端，推原禍始，實由該前長官要結亂兵，擅離職守，以致藏民茹痛，邊境騷然，已屬罪無可逭”。<sup>⑪</sup>在此“申令”中，袁世凱和北洋政府認定辛亥時期西藏事件為變亂，鍾穎應承擔罪責。同時，該“申令”將辛亥時期西藏發生的系列事件視為整體，否認西藏發生革命。袁世凱死後，鍾穎之妻及故舊部下向北洋政府訴其冤屈所形成的《藏事陳略》與《藏亂紀略》等文，亦無法撼動袁世凱所認定的辛亥時期西藏“變亂說”，只是將“變亂”責任推向革命的發動者，將鍾穎說成秩序的維護者。

1931年，陸興祺撰成《西藏交涉紀要》，由於其民國初年在西藏事務中角色關鍵，此書影響頗大。<sup>⑫</sup>陸在《西藏交涉紀要》中對辛亥時期西藏事件的原委及性質均有述評，前文已有所提及。他稱西藏辛亥革命發動者和領導者為“亂黨”，如“亂黨見事急”，又如“故亂黨得以次第劫掠兵備處、總銀庫、製造廠、銀元局等，並脅藏人支烏拉馬四千匹、銀十二萬兩，以作回川路費；一面又函約後藏江孜、靖西、波密各營隊同回四川，以致亂事益加擴大”，等等。<sup>⑬</sup>陸興祺認為：“入藏川軍之叛變，其總因固由感受川路之影響，而釀成此叛變之原因甚多，其大要約有三端。”此“三端”分別為：第一，軍紀不良。鍾穎招募的川軍官兵，為哥老會成員者很多，造成“軍令不行，紀綱日替”。第二，同僚齟齬。清朝駐藏大員聯豫、鍾穎、羅長禔等之間的矛盾，釀成此亂。第三，撫綏失當。駐藏川軍在最初鬧餉，聯豫等“不善撫綏以促其叛”。<sup>⑭</sup>事實上，陸興祺在《西藏交涉紀要》中系統化和強化了他對辛亥時期西藏事件的看法，認為西藏辛亥革命不該發生，駐藏川軍等應承擔罪責。1994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出版的《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六冊，節錄《西藏交涉紀要》不少內容。

#### 四、餘論

相比否定西藏發生辛亥革命的史料，肯定西藏辛亥革命的史料極為稀少，可謂幾近於無。前文提及孔慶宗《辛亥革命中駐藏川軍起義始末》，是在辛亥革命後30年左右，作者在“訪問身親其事

的漢藏老人”基礎上撰成。1957年，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辛亥革命》，第七集目錄中有“西藏起義清方檔案”，從命名含有“西藏起義”四字來看，其意在肯定西藏辛亥革命，然收錄的檔案史料則均出自仇視革命的敵方之手，並無正面敘述西藏辛亥革命的史料。<sup>⑤</sup>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回憶錄》收有兩文，其中桑頗·才旺仁增和朗頓·貢嘎旺秋的《回顧辛亥革命前後的西藏情況》對西藏辛亥革命持肯定立場；另一文《辛亥革命時西藏人民的祝願》對具體的西藏辛亥革命沒有提及。<sup>⑥</sup>造成以上情形的原因是，西藏辛亥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在起義後面臨攻打色拉寺造成的困境，被仇視辛亥革命的鍾穎與聯豫等殺害；革命失敗，發動者和領導者皆死，不少駐藏川軍官兵由於形勢變化而否認曾參加革命，甚至誣過他人，何談留下正面講述這場革命的史料。將辛亥時期西藏事件認定為“變亂”，是袁世凱和北洋政府的立場和觀點：不需要分辨發動革命的何光燮們與殺死他們的鍾穎等人之間的不同，需要籠絡西藏地方統治者，需要有人為辛亥時期西藏事件負責。

1911年11月13日，在清朝駐藏官兵與哥老會骨幹成員領導下，拉薩發生革命；在領導者郭元珍、何光燮被殺害後，西藏辛亥革命以失敗告終。以上皆為不容否定的事實。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留下來的相關史料幾乎均為敵視革命者所書寫。後人在閱讀那些絕大多數否定西藏辛亥革命的相關史料和論著時，一定要辨析和溯源，釐清事實與立場，庶可接近歷史本相。

①自改革開放至20世紀末(含2000年)，學界視辛亥時期西藏事件為“革命”與“變亂”者，可以說旗鼓相當：丁善文《試論辛亥西藏起義》(《藏學研究論叢》第1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1~167頁)、高鴻志《英國與中國邊疆危機》(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7~252頁)、周偉洲主編《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第339~343頁)等，均認為在駐藏川軍中發生武裝起義，即發生了西藏辛亥革命；而牙含章編著《達賴喇嘛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8~241頁)和《班禪額爾德尼傳》(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0~224頁)、喜饒尼瑪《近代藏事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5~70頁)等，均認為辛亥時期駐藏川軍的行為係一場變亂、動亂。自21世紀以來，除了後文舉例，以筆者目見，許廣智主編《西藏地方近代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0~242頁)認為，辛亥時期西藏拉薩等地發生了以駐藏清軍為主的武裝起義。伍昆明主編的《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福建廈門：鷺江出版社，2006年，第338~349頁)亦認為辛亥時期駐藏川軍發動了武裝起義。周偉洲主編《西藏通史·民國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

社，2015年，第6頁)認為，“駐藏清軍回應內地革命的起義，很快就蛻變為兵變，造成動亂。”而呂昭義《英國與中國邊疆危機(1911~1947)》(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第115~120頁)、盧秀璋《論“西姆拉會議”——兼析民國時期西藏的法律地位》(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3年，第63~64頁)、鄧銳齡等《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第821~823頁)、吳彥勤《清末民國時期川藏關係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3~87頁)、白瑪朗傑等總主編《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28~31頁)、劉麗玲《哥老會與晚清西藏變局》(拉薩：《西藏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等均認為，辛亥時期駐藏川軍的行為是一場變亂。

②郭卿友編著：《民國藏事通鑑》，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12~15頁。

③張召庸、喜饒尼瑪：《清末民初拉薩動亂性質初析》，北京：《中國藏學》，2011年第1期。

④《辛壬春秋》作者尚秉和係光緒進士，曾任京師大學堂教習。該書寫作始於1912年，記錄辛亥(1911)、壬子(1912)兩年全國各地發生的重大事件，1924年刊行。有關西藏的內容見於“西康第二十

二”，後以《西藏篇》之名收入《西藏研究》編輯部編《民國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②⑨尚秉和：《辛壬春秋》，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第127~128頁。

⑥⑤④陸興祺：《西藏交涉紀要》，張羽新、張雙志編纂：《民國藏事史料彙編》第十五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第288頁；第288頁；第289~290頁。

⑦房建昌：《西藏辛亥年及其餘緒編年事稽考——以英國檔案為中心》，北京：《中國邊疆學》，2014年第1期。

⑧⑩憂患餘生：《藏亂始末見聞記》，張羽新、張雙志編纂：《民國藏事史料彙編》第十八冊，第409頁。

⑨陳渠珍：《茫野塵夢》，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9頁。

⑪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6），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2352頁；第2352頁；第2380頁；第2356頁；第2358頁；第2358頁；第2357頁；第2364頁；第2367~2368頁；第2370頁；第2373頁；第2404頁；第2362頁；第2368~2369頁；第2392~2393頁。

⑫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6），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2352頁；第2352頁；第2380頁；第2356頁；第2358頁；第2358頁；第2357頁；第2364頁；第2367~2368頁；第2370頁；第2373頁；第2404頁；第2362頁；第2368~2369頁；第2392~2393頁。

作者簡介：康欣平，西藏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陝西咸陽 712082

[責任編輯 陳志雄]